

# 马克思道德哲学的三维证成

杨 荣\*

〔摘要〕 如何证成马克思存有道德哲学是深入探讨马克思道德哲学的前提性和基础性的问题。面对众多的质疑与批判,有必要从概念层面对“道德就是意识形态”进行概念分析与背景挖掘,从逻辑层面揭示“事实与价值”分离给马克思道德哲学带来的“隐秘危机”,从实质内容层面批判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机械理解。这三个维度不仅是由表及里、由“形式”到“内容”的病理探究,而且也有利于在应对当代道德哲学对马克思的发难的同时,丰富和拓展阐释马克思道德哲学的视阈。

〔关键词〕 马克思 道德哲学 意识形态 事实 价值 历史唯物主义

〔中图分类号〕B82-0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7)01-0069-07

DOI:10.13904/j.cnki.1007-1539.2017.01.009

众所周知,马克思既没有专门的道德哲学著作,也没有构建宏伟的道德哲学体系。但就整个哲学著作与思想发展来看,却无不充斥着对现实不公的道德义愤和洋溢着对美好道德愿景的向往。因此,若要深入讨论马克思道德哲学,首先要解决的便是马克思有没有道德哲学的问题。也即,以何种方式才能正确地介入马克思道德哲学,从而澄清和证成马克思道德哲学的存有。为此,需要从三个维度出发进行逐一的证明。进而言之,首先,从概念层面进行清理。在辨析“道德就是意识形态”的过程中,指出“道德”与“意识形态”的内在关系和“道德就是意识形态”所蕴含的精神实质,从而确立马克思道德哲学在概念层面的存有。其次,从逻辑层面进行分析。在反驳马克思对“事实与价值”二元分离的过程中,厘清马克思实现“事实与价值”二者统一的基础,从而确立马克思道德哲学在逻辑层面的存有。最后,从实质内容层面进行论证。在讨论“历史唯物主义与道德的关系”的过程中,廓清历史唯物主义的界域以及与道德和解的可能性路径,从而确立马克思道德哲学在实质内容层面的存有。

下面就从上述三个维度进行具体的分析与说明。

## 一、“道德就是意识形态”的清理

“道德就是意识形态”是介入马克思道德哲学首当其冲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一问题的复杂性与棘手性是不言而喻的。马克思在文本中明确提及“道德就是意识形态”。而且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评了施蒂纳对共产主义者进行的道德说教,在《共产党宣言》中要求彻底废除道德而不是对其加以革新,在《资本论》中进一步对代表“永恒真理”与“永恒信仰”的正义观念进行了釜底抽薪的驳斥,最后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将“平等”“权利”“分配”等道德词汇归结为“陈词滥调的见解”和“空洞的废话”,强调应当将其从党内清理出去并还原现实主义的观点。凡此种种都体现出马克思对道德承诺的排斥与否弃。加之,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对“三大社会发展阶段”和“五大社会发展形态”的经典论述,人类社会在进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后,道德已经失去了其存在的现实根基,如同宗教一样将会从人类意识中自行消失。除此之外,马克思还将

\* 作者简介:杨 荣,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博士生(吉林长春 130012)。

意识形态定性为把特殊阶级的利益说成是普遍的人民群众的利益的具有扭曲性、蒙蔽性的社会统治工具。如此一来道德作为意识形态就合乎逻辑并且顺理成章地应当予以抛弃,使人们从道德或意识形态的漩涡中摆脱出来。吊诡的是,马克思并没有完全弃绝道德,而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的过程中更多地运用了道德的词汇、道德的论证,因此,“道德就是意识形态”并不能如上述作一简单而独断的理解,需要从基本的概念入手给以“清理地基式”的重新梳理。

首先,对于“道德就是意识形态”这一命题,首要的质疑是:“道德”是不是“意识形态”?答案当然是否定的。“道德”和“意识形态”在马克思那里是作为“上层建筑”而存在的,如果“道德”等同于“意识形态”,那么很容易得出的结论是“道德”等同于“意识形态”,同时也等同于“上层建筑”。但是很显然,在马克思那里三者并不是同一个东西,并不是所有的道德都是意识形态。如果以“上层建筑”作为全集,可以合乎逻辑地得出如下命题:(1)道德属于上层建筑;(2)意识形态属于上层建筑。从(1)和(2)可以得出三个子命题:(3)道德是意识形态;(4)并非所有的道德都是意识形态;(5)并非所有的意识形态都是道德。从(4)和(5)可以分别得出两个子命题的子命题:(a)道德与意识形态相交;(b)意识形态相容于道德;(c)意识形态与道德相交;(d)道德相容于意识形态。下面将依次对其分析。(6)如果(3)道德是意识形态成立,那么依据(1)和(2),道德、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三者是一致的,同理,依据意识形态的虚幻性、蒙蔽性等特征应当从人类世界观中排除,这样便排除了包括一切的人类文化,显然与事实不符。(7)如果(b)意识形态相容于道德,那么依据意识形态的特征应当排除具有意识形态特征的道德,虽然保证了非意识形态道德的存在,但是却缩小了意识形态的应用范围,并非只有道德之中含有意识形态,其他非道德的物质因素中同样含有意识形态。(8)如果(d)道德相容于意识形态成立,那么依据意识形态的特征,道德与意识形态一并应当被排除,但是这样同样缩小了道德的应用范围,道德除了具有评价性功能,还具有规范性功能。(9)如果(a)道德与意识形态相交成立,那么既排除了对道德概念的狭隘化,也排除了对意识

形态概念的狭隘化,同样也在马克思的意义上指出道德就是意识形态的实质。道德与意识形态相交的部分正是马克思批判的以维护统治阶级利益而制造的虚幻性、蒙蔽性的道德,而这些道德具有明显的阶级性,当然是应当排除的。但是对于非意识形态的道德,马克思并没有武断地抛弃。上述论证表明,(6)(7)(8)或者因为与现实不符,或者因为概念的狭隘性,逐渐暴露了自身的片面性,(9)的区分既澄清了“道德就是意识形态”的实质,也捍卫了马克思对道德的保留。

其次,要对“道德就是意识形态”进行深层清理,还必须诉诸马克思当时的时代境遇与写作背景。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对人类的最大贡献,它不仅为哲学研究提供了新鲜血液,而且为人文社会科学提供了科学的研究方法。任何架空历史而谈马克思的尝试都是毫无意义的徒劳。反观马克思身处的德国历史,虽然黑格尔哲学体系处于瓦解中,但是仍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特别是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仍然活跃于人们的思想领域。加之,马克思在大学及工作期间受到康德、费希特、黑格尔以及费尔巴哈等人的影响,相信理性与自由意志对现实社会及其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随着理论研究的逐渐深入和对现实利益的接触,马克思意识到这种颠倒的世界观与历史观的致命缺陷——意识决定存在。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指出,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应当将这种头足倒置的理念倒置过来。在《论犹太人问题》中,他通过对鲍威尔政治解放局限性的批判,进一步指出,人类的解放不应当到宗教的对立中去寻找,真正的根源在现实的犹太人那里,人的现实性是人类解放的前提。“道德就是意识形态”的第一层意思是对当时德国观念论的批判。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并在其后进一步阐释的基础上,将意识形态归于上层建筑,不仅再一次批判了德国观念论,而且将其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功能性解释,是在现实的人的生产活动过程中的派生物。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将其具象到阶级社会,认为资产阶级将自身的阶级利益说成是人类的利益,将自由、平等等观念说成是每一个人的自由与平等,既是对事实的歪曲,也是对阶级统治与阶级利益的维护与辩护,是一种彻底的意识

形态幻想。概而言之,道德被当作意识形态在马克思那里具有三层意思,即“历史唯心主义”“功能性的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的幻想”<sup>[1]</sup>。这样看来,马克思并没有抛弃或否定道德存在的合法性,而只是抛弃或否定了含有意识形态成分的道德。

概而言之,不论是对“道德就是意识形态”进行的纯粹的概念分析,还是对其产生的时代背景的深层剖析,都没有显示出马克思绝对的“道德空场”,反而显示出马克思存有道德哲学的可能性。

## 二、事实与价值分离的“隐秘危机” 与统一基础的“重现”

通过对“道德就是意识形态”概念层面的分析,我们看到并不是所有的道德都是意识形态,马克思对其的批判也是有一定界限的,而不是全盘否定。如果说这只是在概念层面的清理,那么要深入推进对马克思道德哲学的研究就需要从逻辑层面给予一定的澄清,而逻辑层面的介入是以对事实与价值关系的分析为基础的,因此,对事实与价值关系的分析就成为谈论马克思道德哲学的又一重要方式。当然不可否认的是,马克思并没有直接从事实与价值的关系层面来谈论问题,但是如果仔细考察马克思的整个思想便会发现其中蕴含着诸多与其相关的观点与论证。

最先从事实与价值角度对马克思的道德哲学进行探讨的是建立在二者分离基础之上的“价值共识说”,认为道德的客观性不是来自于“事实”,而是来自于人们的一致认可。在马克思那里这一点突出体现为价值目标是共产主义社会,而价值主体为工人阶级。

在文本中马克思不止一次地对资本主义社会提出激烈的批评与谴责,究其原因在于现实的不公使人们很难达成一致,充其量只是得到特权阶层的同意。而共产主义社会在诸多方面要比资本主义更优越,更易于得到人们的认可。克莱恩指出,“马克思所有工作的动力,(包括)早期和晚期,都来源于对资本主义的历史性克服和未来由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所替代”<sup>[2]</sup>。“首选的社会制度将是一个超越资本主义的制度。”<sup>[3]</sup>这种超越性和优越性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真正实现了人的解放。早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在与鲍威尔的论战

中,马克思就明确区分了“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认为鲍威尔诉诸“政治解放”解决犹太人问题,由于其狭隘性,即使实现了政治解放,宗教的对立依然存在,因此要实现真正的解放必须从更高层次的人的解放角度来理解,这样不仅能够解决犹太教与基督教长期存在的宗教对立问题,而且也可以摆脱政治解放的狭隘眼界。其二,废除了“不平等”的平等权。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交易原则是公平平等的最大例证。只要卖者与买者不是在强迫的情况下进行的交易都是公平、公正的。但正是这种平等原则掩盖了实质的不平等。工人创造了最终的价值,但却没有得到应有的价值,得到的工资仅是自身所创造的价值的一部分,完全违背了按劳分配的原则。其三,消除了阶级剥削。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无阶级的社会,社会财富是通过劳动者共同联合而创造的。每个人拥有的只是劳动,消费的只是个人消费品,没有任何剩余可转化为私有。更为重要的是,在共产主义社会人不再仅仅只是一个劳动者,而且是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创造者。资本主义的最终目的是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利润的创造,人的价值与人的需求的满足成为附属的考虑。加之,资本主义崇尚自由竞争,相信“看不见的手”对市场的调控,事实是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出现和资源的严重浪费,同样也违背了按需分配的原则。除了对共产主义的优越性进行论证以外,马克思还指出这种优越性价值的共识主体是工人阶级。当工人阶级意识到自身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时,便会在同等生产力的情况下形成自己不同于资产阶级的道德观与正义观。而伍德所谓的道德规范与生产方式相适应就是正义,与生产方式不一致就是非正义,是对马克思正义观的狭隘理解,忽视了阶级在道德共识方面所具有的重要作用。

初看起来,“价值共识说”是对马克思存有道德哲学的捍卫,如若仔细分析便会发现其中存在“隐秘的危机”。价值共识论的实质是通过重新定义道德的客观性来证明道德的客观性,认为道德的客观性不是以事实为基础的,而是人们相互之间对某一事物达成的价值认同。但是用这种价值共识论来证明马克思道德的客观性具有如下的局限性。其一,从规范性角度来批判资本主义,而不是从事实角度来批判资本主义,实质上与马克思的思想相背

离。价值共识论承认事实与价值的分离,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正义与不正义是通过道德规范来评价的。随之而来的反驳便是马克思并没有依据道德规范来批判资本主义,事实上依据的是生产力。其二,价值共识论预设了价值的可通约性,试图发展出一种普遍的道德观念,以此评价人类发展史的任何一个社会和任何一种具体的现实状况。它实质上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认为人们能够在纷繁复杂的现象界背后找到一个统领一切的价值标准,以一驭万。这不仅没有使共产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得到辩护,反而招致了更多的质疑:如果共产主义的价值理念与资本主义的价值理念是可通约的,那么凭什么断定共产主义的价值理念比资本主义的价值理念优越?如果共产主义的价值理念与资本主义的价值理念是不可通约的,那么为什么能够用共产主义的价值理念来评价资本主义的价值理念?其三,价值共识论将人还原至“自然状态”和“无知状态”,认为在这样的状态下人们都会不约而同地选择共产主义,忽视了人所处的阶级、地位、利益、偏好等差异性多样性。现实的情况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属于不同的阶级、拥有不同的地位、享有不同的利益与偏好,自然在选择与舍弃共产主义方面会产生分歧。即使是处于同一阶级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也会由于种种原因在对待共产主义方面出现分歧。比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具有资产阶级的身份但是却坚信共产主义的到来,蒲鲁东和拉萨尔具有无产阶级的身份却为资产阶级辩护。

实质上,马克思并没有将事实与价值分离,而是内在地实现了二者的统一。毋庸置疑,人是马克思哲学的核心,也是马克思哲学的出发点。马克思并不意欲说明共产主义是什么或社会主义是什么,而是致力于什么样的社会能够满足人的需要和欲望。人作为现实性与理想性、自在性与自为性、物质性与精神性的统一体,天然地具有沟通事实与价值、描述与规范的功能,这一功能具体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人的需要和人的尊严。

人的需要是马克思极为关注的方面,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通过对人与动物的比较指出,动物只是按照自己的物的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不仅能够运用物的尺度和需要,而

且也能够运用内在的尺度与需要来构造。前者指人的动物式的需要,后者指超越动物式需要的其他需要。勒丝将其概括为“生存的需要”与“发展的需要”。物质需要是一种本能的需要,而发展的需要则包括文化、情谊、爱等的道德需要。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后者逐渐退化成为一种仅仅满足物质的需要,仅仅注重量的积累与数的增长,人的全面的需要完全异化了。“生存的需要”作为事实层面的需要,对于自我的保存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发展的需要”也是人的需要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只有在“生存需要”的现实支撑与“发展需要”的价值规范的情况下人的需要才能得到平衡发展,也才能真正沟通事实与价值两个方面。戴维·布雷布鲁克也认为在马克思那里人的需要是沟通事实与价值的中介,但是人的需要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分为“真实的需要”和“虚假的需要”。由于工业的发展和商业的刺激产生了许多“虚假的需要”,使“真实的需要”淹没于其中,导致的一个严重后果便是“现实性”超越“理想性”。人不再苦心考虑人的需要应当是什么,只是消极地服从与接受人的需要是什么,把积极的超越性的存在变成了消极的现实性的存在。“商业化打破了重要的道德规范,以及由此产生的混乱的标准有利于(至少)创造虚假的需要。”<sup>[3](8)</sup>简言之,马克思对人的需要的全面性的追求其实就是在“现实性”与“理想性”、事实与价值统一的基础上来谈论问题的,而资本主义的片面发展正是造成事实与价值分离的根本原因,因此推翻资本主义、瓦解资本逻辑就成为实现人的需要全面性的必然选择,同时也实现了事实与价值的自然呈现。

与人的需要具有“家族相似性”的是人的尊严。马克思“所关心的完全不是把共产主义描绘成一个充足的社会,他所关心的是把共产主义描绘为一个充满人的尊严的社会”<sup>[4]</sup>。人的尊严的阐释使马克思具有浓重的道德与价值维度,但是这并不代表马克思是在抽象的先验层面谈论人,而是深刻地依托着现实的人。与康德在可普遍化的原则下实现人的尊严不同,马克思将人的尊严的实现落到了具体的现实世界。人的尊严的实现场域是社会,准确地说是在社会关系中;实现途径是实践活动;只有在现实的社会之中,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

身才能具体地体现出来,人的尊严也才能在与他人、与社会交往的过程中体现出来;在改造客观世界,具体地说是在改造社会关系的过程中,提升与重塑自身的价值。因此,马克思所说的人的尊严既具有现实性的向度,也具有超越性的向度,使人的事实与价值具有现实的不可分离性。

因此,通过对事实与价值内在联系的基础——人的需要和人的尊严的“重现”,我们以清晰的、更为符合马克思本意的阐释捍卫了马克思存在道德哲学的独特性——不是一种康德意义上的抽象道德建构,而是在现实意义上的道德实践。

### 三、对“决定论”的批判及实现 “道德”与“历史”和解的重释

道德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问题是介入马克思道德观的又一方式,因为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哲学的核心,既体现了自身的独特性,也体现了哲学史上的革命性转向。如果撇开历史唯物主义而谈道德,很可能使道德陷入唯心主义的泥潭或抽象的逻辑论证和演绎,很难把马克思与其他道德哲学家区分开,最终导致对马克思道德观的谈论成为无独特性和无超越意义的文字堆砌。如果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谈论道德,依据“经济决定论”“技术决定论”和“历史决定论”的阐释,道德便会成为“经济”“技术”和“历史”的“被决定者”“依附者”或“从属者”,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前者强烈的主宰性与现实的直观性,最终可能导致对道德的排斥与否认。因而,要以道德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问题介入马克思的道德观,首要的则是阐释历史唯物主义,即何种意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才是马克思所谓的历史唯物主义,进而才能在马克思本真的历史唯物主义之下谈论道德,谈论如何才能实现二者的统一与和解。

历史唯物主义自产生以来就备受人们的关注,对其的阐释也是纷繁复杂、形态各异,而其中颇具影响力的则是“决定论”的阐释。“决定论者”认为依据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之“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经典表述,人类历史的发展是由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更新决定的,没有这一基础性的变革,人类社会就不可能有所进步。对此,考茨基就曾指出,历史唯物主义考察的

对象是社会,而不是单个的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由经济的发展起作用,而不是由人的主观动机起作用。马克思并没有“把那种关于人的本质的学说归结到经济学”<sup>[5]</sup>。具体而言,他区分了“经济动机”与“经济条件”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明确批评了以“经济动机”为立论基础的功利主义试图以个人利己来推动经济与社会的做法,不仅忽视了“经济条件”的客观现实性,而且也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无休止战争。人的一切活动都是以“经济条件”为现实的前提和基础的,无论“经济动机”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具有多大的吸引力与持久性,“似乎与马克思称之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根本就没有什么关系”<sup>[6]</sup>。普列汉诺夫也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新的历史观,关键在于他摒弃了将社会心理或“经济动机”作为主导历史发展的臆想,肯定了经济对其的决定性与基础性作用。饶勒斯更是在批评调和唯心史观与唯物史观的折衷做法的同时,明确地将历史唯物主义称作“经济决定论”。与其具有同构特征的“技术决定论”则将经济的决定作用具体到技术因素,认为当马克思论述到预示着资产阶级革命到来的三大发明时,就曾给予了科学高度的评价。恩格斯也指出,“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sup>[7]</sup>。为了深入探讨科学技术,马克思阅读了大量的关于技术史与工艺学的著作,比如拜比吉的《论机器和工厂的节约》、波佩的《工艺学教程》以及舒尔茨的《生产运动》等,细致地研究了简单的工具如何一步一步转化为机器,对工具与机器的区分实质指出的是生产方式的变革,工场手工业是以劳动力为起点,而工厂大工业是以劳动资料为起点。当然并不是说工场手工业时期没有劳动资料,工厂大工业没有劳动力,而是说两个阶段的侧重不一样。在前一阶段是劳动资料围绕劳动力转,后一个阶段则是劳动力围绕劳动资料转。前一阶段是人支配工具,后一阶段是机器支配人,两个阶段的转化是简单工具的运用发展到复杂机器的操作深刻变革的结果。因此,马克思才得出“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sup>[8]</sup>的结论。威廉姆·肖断言马克思是承认“技术决定论”的,“因为技术是现代工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sup>[9]</sup>,是推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重要动力。在历

史唯物主义的阐释中,科学作为一种生产力,也是得到马克思的积极评价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观点,虽然承认了生产力的至上性,但只是作了宽泛的理解,并不符合马克思的本意。在马克思那里应当理解为“构成直接生产过程本身的因素”<sup>[9][10]</sup>;生产力的发展是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相互作用的结果,发展的标志集中体现在生产工具上。新工具的出现必然是以新技术的发明为前提的,技术是决定生产发展的关键因素。为此,威廉姆·肖将“生产力决定论”修改为“技术决定论”。

历史唯物主义之“经济决定论”和“技术决定论”的共同特征都是将“经济”“技术”作为历史发展的主导性和决定性因素,从而使自然历史成为一种无人身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运动过程。排除了人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也就排除了人所具有的道德因素在历史发展中的注入。历史唯物主义与道德成了水火不容的两极。值得深思的是,“决定论”是不是等同于历史唯物主义,是否是马克思的本意?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其实在“决定论”的阐释面世以来就遭到各方的批评。一方面,它运用一种还原论的方式,将历史唯物主义还原为“经济”或“技术”的唯一因素,忽视了马克思在“归根到底”意义上的修饰与限定。另一方面,它也忽视了历史发展过程中“诸要素”的辩证关系,把历史看成“线形式”发展,而不是“螺旋式”发展。

事实上,马克思认为,历史不是“无人身的理性”,而是现实的人及其活动面向未来的筹划。这一转换根本上实现了从知性逻辑向感性实践活动的跨越。正是在此基础上,历史才能呈现出人与世界的“共在”以及存在者的“敞开”,实现人类的解放。现实的人既不是旧唯物主义直观理解到的感性,也不是唯心主义抽象发展的能动性,而是集自然、精神、社会于一体的真实存在。《手稿》中肯定了人的自然性,《提纲》中强调了人的社会性,《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确立了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现实的个人,认为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属性与精神属性才能焕发出它应有的价值。人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必然要与他人合作、同他人交往,在合作与交往的过程中形成一定的社会关系。在此过程中人们对宗教、哲学、艺术以及正义、自由、

平等的夙求才能得到充分的表达与应有的回应。也只有共同的社会合作与交往中,形成共同的社会背景,人的精神需求才会有一定的认同和承认的现实性。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处于普遍的异化之中,人的创造性的、自由自觉的活动被片面的、单一的异化劳动所代替。人只有在吃穿时才能体会到自己的存在,除此以外,只是一个活着的机器。历史要获得发展必须消除私有财产、推翻资本主义,瓦解资本对人的统治,复归人自由而全面的创造性,实现人的解放。这也成为马克思穷其一生奋斗的精神与道德动力。因此,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并没有排除人,而且也对人如何成为人以及人类解放的问题予以了高度的关注。任何道德的产生都是社会实践活动的结果,并随着社会实践活动的变化而变化,没有永恒在场的道德律和绝对同一的道德感。即使是以理性建构的道德或以情感建构的道德归根到底都是社会实践活动的产物。恩格斯认为,虽然历史上存在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相适应的道德,即封建贵族的道德、资产阶级道德和无产阶级道德,但是“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sup>[10]</sup>。从这种意义上讲,道德一方面具有现实的依存性,另一方面具有传承性。每一个社会的道德哲学家都会依据社会现实为其所在的社会寻找合理的道德根基,并为社会的现实性进行论证。相对于社会中较为具象的地域、民族、宗教、风俗、习惯等,人们又会为之提出不同的标准和不同的解释原则。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道德的发展也不会凭空出现或出现断裂,而是在已有道德的基础之上发展出来或者对已有道德批判的基础上形成的。

虽然道德是由社会实践活动中产生的,但它并不是“决定论”所说的严格决定或严格的“一一对应”。从另一个层面讲,道德也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尤其是社会发展呈现急剧动荡和剧烈变化的时期,道德往往会呈现一种多样性:一部分道德哲学家可能倾向于对传统道德的保护而进行坚定的捍卫,另一部分道德哲学家可能倾向于对传统道德的摒弃而进行激烈的拒斥,甚至出现一部分道德哲学家在传统道德与未来道德的选择与论证中始终左右摇摆。即使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发展时期,道德有

时也会出现相对的滞后或超前。滞后是因为社会中新鲜事物的发展需要一定的时间,而在新鲜事物从萌芽到发展这一段时期,道德的空白区也需要时间来填补。超前是因为部分极具前瞻性的道德哲学家对时代的精神和道德的困境具有较为敏锐的洞察,因而“跨时代”地提出“重估一切价值”。

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道德的基础,其革命性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是现实性;二是辩证性。相较于理性与情感,马克思把道德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之上,也即为道德寻找到了现实的根基。如果说前者是对道德合法性的纯粹理论论证和逻辑推演,那么后者则是对道德合法根基的现实关照。它在现实性上揭示了理性与情感的真实根基,也在一定程度上找到了意识形态批判的有力杠杆,通过实践摧毁了一切形而上学的迷梦,消除了长期的二元对立。实践作为主体与客体、自由与必然的矛盾统一体,克服了旧唯物主义直观的片面性,也克服了唯心主义抽象的片面性,在批判的基础上将二者统一起来。

### 小 结

至此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何种方式是介入马克思道德哲学的正确方式?通常情况下,人们倾向于从道德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角度来介入马克思的道德哲学,不可否认,这是介入马克思道德哲学不可回避的话题,但是仅仅从这一角度出发是否能够真正解释清楚马克思道德哲学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可以说,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来探讨马克思道德哲学,是从宏观的角度廓清了马克思存在道德哲学的可能性,但是在微观层面的概念清理与逻辑分析的触及却具有一定的限度。尤其是面对当代哲学对马克思道德哲学的发难,更需要从微观层面给予回应。然而进一步思之,“概念的清理”“逻辑的分析”与“内容的澄清”三者也并不是孤立甚至两极对立的,而是具有内在的相关性与一致性。就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现状来看,马克思有没有道德哲学则是介入马克思道德哲学的一个更为基础性和前提性的问题,无论是概念层面的清理、逻辑

层面的分析,还是内容层面的澄清都是解决这一问题不可避免地要面临的。如果仅仅从历史唯物主义与道德的关系角度出发,也即内容层面的澄清,不仅会遇到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比如道德相对主义、道德怀疑主义和道德虚无主义的责难,而且也不自觉地缩小了哲学的阐释域,失去了其丰富性和多样性。因此,概念层面的清理,不仅是介入马克思道德哲学首要面临的问题,而且也是在为“逻辑的分析”和“内容的澄清”作铺垫。我们在对马克思“似是而非”的道德词汇与话语的清理中确立其对道德的态度与立场,从而在逻辑的层面确立其追寻道德可能的“中介”,最后在实现历史唯物主义与道德和解的同时给予马克思道德哲学以实质性的回应——人类解放。因此,“概念的清理”“逻辑的分析”与“内容的澄清”成为回应马克思存在道德哲学不容忽视的“三角支架”。

### 参考文献

- [1] Allen W. Wood, *Karl Marx*, Routledge, 2004, pp. 119-120.
- [2] George L. Kline, Was Marx an Ethical Humanist? *Studies in Soviet Thought*, Vol 9, 1969, p. 97.
- [3] David Braybrooke, *Moral Objectives, Rules, and the Forms of Social Change*,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8, p. 15.
- [4] Kamenka, *The Ethical Foundations of Marxism*,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62, pp. 156-157.
- [5] [德]卡尔·考茨基. 唯物主义历史观:第1分册[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20.
- [6] [英]波普尔. 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2卷[M]. 陆衡,等,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168.
- [7]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375.
- [8]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42.
- [9] [美]威廉姆·肖. 马克思的历史理论[M]. 阮仁慧,等,译.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22.
- [10]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34.

责任编辑:陈 菊